

蔡履平

邁向書畫篆刻的頂峰

來自內地浙江省的書畫篆刻家蔡履平，以自己的刻印作品登上了香港中文大學的展台。仔細審視他每一件作品以及蘊藏在作品背後的心思，不難發現他對書畫篆刻有着高度和深刻的抽象文化思維。如今，已經被政府列為「非物質文化遺產」的陶瓷印，在他手中又將顯示出怎樣的意境呢？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

燒製陶瓷印，工序繁雜

蔡履平是浙江蕭山人，是西湖水滋養下的吳越才子，已經從事了三十多年書畫篆刻創作。他的作品，既有民間的質樸，也有學院派的嚴整，這與他的師承有很大的關係。他早年一直拜中國美術學院雕塑系前主任周輕鼎為師，從中學到了兼具東西方特質的雕刻工藝手法。據蔡履平介紹，早期由於雕塑不熱門，周老師只招收了一個學生便到各個陶瓷廠去教學，為後來蔡履平的學藝奠定了基礎。

國畫、書法與篆刻三者的關係密不可分。蔡履平認為，陶瓷印是以「印」為中心，印的核心是字。字有六書，因而對書法的掌握是必不可缺少的工具，而將陶瓷印變為美麗的工藝品，還需要外觀的色彩設計。這就是國畫藝術的延伸，可以將平面化的國畫變得更加有立體感。國畫的作用在於用抽象的心境描繪來構建立體的視覺，當雕刻家將色彩點綴於印章上時，其實是將三種不同的華人民間藝術美凝聚於一處。

蔡履平指陶印的製作可分為六個步驟。第一個是取土，中國的陶土分佈極為廣泛，常見的有宜興紫砂、杭州蕭山十三房紅陶、嘉興的黑陶等。其次是製坯，製坯時需要捏泥，不能夠產生氣泡，以免後來發生爆炸，因此要十分小心，坯印也要燒製乾透。第三是雕印，雕刻家根據自己的理念組製陶印，由於每個人的表現手法不同而出現古樸或典雅的差別。製印的方式也有很多，或雕或塑或印模，只要把握得當，組製便是印刻中最具藝術感染力的部分。下一個步驟是印面，刻製印面與刻製石章一樣，這個步驟是對雕刻家刀工的考驗，也是隨性發揮的舞台。然後是上釉，一旦上釉就變成了聞名遐邇的彩陶，著名的唐三彩便是彩陶的一種。最後是燒製，陶的燒製溫度一般在一千度左右，溫度越高越堅硬。例如，宜興的紫砂，燒製溫度達到1100度，極易保存。經過六道工序完成的陶瓷印，令人心馳神往，愛不釋手。

蔡履平表示，刻印在中國古代原本是與知識分子相互隔絕的。這與刻印的材質有很大的關係。原本的材質與熔鑄技術，需要有很大的力氣，一般書生往往沒有足夠的體力去支撐。但是隨着印章技術的應用日益普及，尤其是與國畫、書法的結合，促使文人開始將刻印當作是藝術審美的行為來看待。元末明初，花乳石的發現與應用，正式讓刻印工藝走入文人階層。那時開始，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，也可以拿起刻刀，刻出心中的願景。

印章是世俗身份的代表

印章在中國的使用，已經不僅僅是一個藝術專長，更是世俗身份的代表和體現。據蔡履平介紹，從戰國時期開始，印章的組製和印章公分的大小，有着嚴

格的等級與分別。例如，皇帝的印章，組製一定是龍，如果其他官員甚至王族成員僱用了龍的組製，可能會帶來殺身之禍。公分也同樣如此，古代的國璽必定呈方形，不能是圓形，體積較大，以表現皇權的尊嚴。這種將世俗身份象徵等元素融入印章的做法，一直延續到今天。在當下的中國內地，公章的造型也是世俗權力的體現。例如，中國政府機構的公章一定是紅色的，以彰顯革命與進步；型製上是圓形，章的正中央往往是五角星，以代表人民群眾。所以，雖然時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，但是印章的世俗性並未改變，只不過跟隨不同的審美標準改變了表現的形式而已。

蔡履平的陶瓷印雕刻工藝已經被政府列為「非物質文化遺產」。每當提起這點，他沒有絲毫的興奮與自滿，反而對未來充滿了憂思。他認為，目前學習印章篆刻的人已經愈來愈少，整個社會都沉浸在功利化的氣氛中，很難想像一個人會花很多時間去學習一個掙不到錢的手藝。即便是學習，也是在業餘時間，在興趣的支撐下去學習。因此，他最擔心的是自己的雕刻工藝沒有傳人。他回憶自己過去的雕刻學習生涯，認為師徒的傳承是中國傳統非物質文化遺產綿延不絕的根本途徑，因為只有在具體、細緻的師徒傳承中，學生才能真正培養對藝術的興趣與情感，也才能夠跟着老師東奔西走，了解不同的藝術前沿和藝術行情。他自己過去是這樣學習的，也期待未來能夠以同樣的方式將自己的手藝傳給得意門生。他不反對「非物質文化遺產」的產業化運作，但是這一切都要建立在工藝後繼有人的基礎上。

文化氣質的符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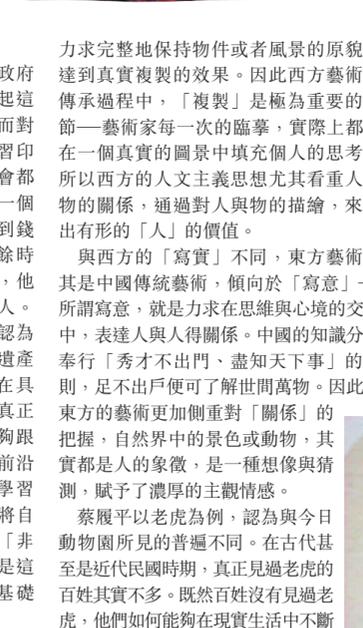
他認為，東西方在藝術的表達上有着巨大的氣質差異。西方的藝術側重寫實，



■蛙印



■以猴為組製的陶瓷印。



■龍印

力求完整地保持物件或者風景的原貌，達到真實複製的效果。因此西方藝術在傳承過程中，「複製」是極為重要的環節——藝術家每一次的臨摹，實際上都是在一個真實的圖景中填充個人的思考，所以西方的人文主義思想尤其看重人與物的關係，通過對人與物的描繪，來突出有形的「人」的價值。

與西方的「寫實」不同，東方藝術尤其是中國傳統藝術，傾向於「寫意」——所謂寫意，就是力求在思維與心境的交錯中，表達人與物得關係。中國的知識分子奉行「秀才不出門，盡知天下事」的原則，足不出戶便可了解世間萬物。因此，東方的藝術更加側重對「關係」的把握，自然界中的景色或動物，其實都是人的象徵，是一種想像與猜測，賦予了濃厚的主觀情感。

蔡履平以老虎為例，認為與今日動物園所見的普遍不同。在古代甚至是近代民國時期，真正見過老虎的百姓其實不多。既然百姓沒有見過老虎，他們如何能夠在現實生活中不斷將老虎轉化為藝術符號呢？方法只有一個——就是想像。這種想像寄託了人們極大的情感與願望。

在陶瓷印中，許多刻印作品都有動物（例如老虎）的形象，這樣的瓷被稱為「瑞瓷」，既有祭品的莊重，也有日用品的實用。陶瓷印中的動物造型往往會隨着雕刻者的心境、地位或者使命的不同而有所差異——龍騰虎躍中的龍和虎，與龍爭虎鬥中的龍虎造型，一定會極大的差異。蔡履平認為，雖然陶瓷印中的動物是抽象的，但是物件本身卻是腳踏實地的生活用品。一個手掌大的虎頭陶瓷印，既可以把玩，也可以裝飾，而且很實用，因此陶瓷印也一定能夠衝出中國，走向世界，讓西方認識到古典中華文化的瑰寶。



■蔡履平自製的篆印圖案。

從民間到學院派的距離

藝術的核心地帶究竟在哪裡？是民間還是學院？記者在訪問蔡履平的過程中，問了這樣一個問題：「您認為自己是屬於學院派還是民間藝人？」蔡履平的回答是：「介於二者之間，因為我的老師是學院派，我自己學習的內容也是學院派，傳播方式也是學院派，但是人卻在民間。」蔡履平的回答帶來了一個比較深刻的思考：學院派和民間究竟有多大的距離？

實際上，「學院派」這一概念，更多的是代表一種方法和硬件的提升。即是在強調分析實證的學科中，方法的正確與硬件的支援是完成科學研究的前提條件，而這一切是散落化的民間不能替代和完成的。但是，在西方還有另一種總是被我們忽略的思潮——經驗論哲學體系。這種思想認為：無論人類在具體的研究中如何精確，我們對世界的認識永遠都存在誤差，永遠都是有限的，也永遠都不能窮盡，所以人類不可能建構出一種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法。如果以這種思想來看，學院派的研究方法需要一種補充——來自何處？答案只能是民間。

這裡的「民間」，不是鄉土，也不是文盲，實際上是一種自發式的學術研究。曾經是蘇俄領袖的列寧，

他的著名學術著作《俄國農村資本主義的發展》一書，是在坐監、流放過程中完成的，卻沒有人能夠忽略其學術價值。而在我國民國時期，大批文學家、藝術家、學者如陳寅恪、沈從文等人，甚至連一個像樣的學歷都沒有，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成為一流的學者。為何？就是因為他們紮根在民間的土壤中，呼吸着自由的空氣，繼承了傳統中國文人「處江湖之遠」仍關心國事、操勞學術的傳統。即便在西方，偉大的音樂家舒伯特，也是出身於民間的藝人，他在最貧窮的時候，甚至以自己心愛的《搖籃曲》去換取一塊牛肉。然而，沒有人能夠否定他偉大的藝術成就。試看今日的奧地利，音樂成為全民的生活，街頭藝人在優美的旋律中浸染着城市的特質。這就是民間文化的魅力，也是民間社會生機盎然的生命力。

梁啟超，大家都知道的民國大家——所謂「大家」，就是因為你不知道該稱呼他為甚麼家。文、史、哲、法、經、政、西學東術，幾乎樣樣精通。如果說他可以當北京大學的教授，那簡直是貶損他——因為他也有參與創建京師大學堂。從考據角度看，後人沒有發現梁啟超有甚麼學位頭銜，更不存在所謂的「接受學



■蔡履平在香港中文大學講授陶瓷印的知識。

院派系統化教育」之實據。內地曾經出版一套由北京東方出版社發行的《民國學術經典文庫》系列叢書，其中對梁啟超的著述加以展示。這套書在1996年出版，分為思想史、歷史以及文學史三大部分，共31卷，梁啟超獨佔五卷。而將「自由」一詞翻譯進我國的嚴復，也是一位偉大的文學理論家、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等。他有甚麼學歷或文憑呢？在沒有廢除科舉制度以前，他上過福州船政學堂，學習軍艦駕駛技術。由於沒有通過科舉考試，他的船政學堂畢業文憑也不值錢，就像今天的職業先修學校一樣。1885、1888、1889、1893這幾年，嚴復四次參加科舉考試，全部失敗。此後他再也沒有參加過科舉，民國成立後，政府卻尊奉其為「碩學通儒」。

如今在我國，沒有學歷、沒有文憑、沒有專著，便

不能夠晉級、加人工。迷戀於形式與方法的學院派作風，甚至對來自民間的一切不屑一顧。在本港，表面上發達的高等教育背後，隱藏了可能仍舊是傳統華人社會中排位子、論輩份的惡質文化。長期隱匿於虛幻的「城邦」意識中，毫不了解世界或內地學術（例如語言風格與社會氛圍）的轉變，更從未想過古希臘的城邦，是有全民性的文化底蘊的，身為奴隸的伊索，也能講出富有哲理的寓言。一千個教授並不等於一千個知識分子，更不等於一千個具有風骨的文人。如果大學裡的教授所欣賞或鍾情的，只是故紙堆中的點點滴滴，而對社會生活與人文情懷毫無考究，那麼看似學富五車的外表，其實也只是社會多餘的「脂肪」而已，毫無用處可言。畢竟，他們的學識不可能成為維也納的街頭藝人，也不會轉化為民間社會進步的力量。因此，如何準確測量學院派與民間的距離，如何將學術日常化、平民化，將是未來振興文化需要面對的課題。

文、攝：徐全